

人类与疫病大战 3500 年

疫，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字眼。从蒙昧到文明，在有文字记录的3500多年里，传染病和瘟疫是人类历经的苦难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，也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抗争的历史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共同努力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日子定会早日到来。



我国民间至今还有逐瘟驱除疫病的习俗。

壹 民间驱除疫病习俗

相传，神农氏除了“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，以省杀生”之外，还“尝味草木，宣药疗疾，救夭伤之命”。他“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就避”。神农氏成了传说中中医药的创始者，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对健康进行保护的始祖。

传说中的黄帝也教民治百病。他“咨访岐伯、伯高、少俞之徒，内考五脏六腑，外综经络、血气、色候，参之天地，验之人物，本之性命，穷神极变”，研究医道。后代把他与当时的一些名医，如岐伯、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编成《内经》，署名《黄帝内经》。人类对医药认识的进步，标志着对疫病治疗从无奈进入了有为阶段。

我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，距今已有3500多年。如甲骨文中的“疾年”，指的就是这一年反复出现规模、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，算是古代记载疫病流行最早的资料。

萌芽阶段的医药对治疗疫病作用十分有限，相对来说，人们对巫术更加寄予厚望。

上古时期，巫师地位不可小觑，他们是活跃于政坛的一个群体，不少人甚至是当时传说中帝王的医学大臣。然而，巫师靠巫术治疫病，毕竟是无知时代人们认识有限的产物，治好者寥寥。宋代朱熹说过：“击鼓舞趋，祈禳疾病曰巫医，是则巫覡之徒，不知医药之理者也。”但当疫病流行时，大批百姓死亡，无助的人们只能把“鬼神作祟”当成是发生疫病的原因，于是请巫师祈祷驱疫。

战国后期，医巫分业。有很多医生极力反对鬼神，名医秦越人每到一地，就大力劝告平民百姓不要相信巫术，提倡要采用医学技术来对付疫病，后来鬼神迷信的影响开始减弱。巫师更偏重于问求鬼神，占卜吉凶；而医师也逐渐形成了独立系统，并作为独立的职业被确定下来，职责为诊病和治疗。

虽然秦汉以后医术逐渐成形，但一些以巫术驱疫的祭祀活动依然传承下来。比如伏日之祭（简称伏祭），以期望祛除毒（即疫病）。从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出土的汉代石刻《逐傩（音nuó）图》中，也可以看到当时打鬼逐傩（傩，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）的生动场面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还有虫豸，逐傩者手中高举扑虫的工具，人们拿着罐、碗等物挥洒的情景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《大傩图》，也是一幅描绘民间驱除疫病习俗的风俗画。

贰 疫病或致曹操兵败赤壁

作为国内较早研究我国古代疫病史的学者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、人文学院博导张剑光在《中国抗疫简史》一书中写道，在我国古代，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，在安定的社会中，虽然疫病仍会发生，但只要有了正确得当的救灾防疫措施，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，规模有限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。人们已经认识到“四时皆有疠疫”，疫病是“气不和之疾”，已能辨别出伤寒、疟疾、蛊、痒疥疾、麻风等传染病。

两汉三国时期的疫病大多发生在南方，像疟疾、痢疾、霍乱以及其他一些肠道传染病都是高发，且较前代明显增多，都与战争脱不了干系。这是因为行军作战时，士兵居住集中，加之卫生条件差，缺吃少穿，为

疫病的暴发创造了条件。

赤壁之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战役。曹操兵败赤壁，造成三分天下，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。那么，曹操人多势众，为何兵败于赤壁呢？原因众多，现在也有学者提出，其中一个因素是当时曹军遭遇大疫，大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，最终导致失败。

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对赤壁之战中的疫病作出描述：“（曹）公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疫，吏卒多死者，乃引军归”。主帅曹操也不承认遭火攻而败北，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封信，信中说“赤壁之疫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”。此外，在《资治通鉴》等史料对曹军发生大疫也有很多记载。

叁 卫生防疫思想古已有之

“上工治未病，中工治欲病，下工治已病。”在抗击疫病之前，防患于未然的卫生预防必不可少。

为了防病，古人对个人卫生十分注意。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、洗澡、洗手、洗脚的记录。考古专家在河南安阳的殷王墓中，出土了壶、盂、勺、盘、铜洗等全套盥洗工具。秦汉时期的法律条令规定，官员每五天一休沐，即五天要洗一次澡。在《大戴礼记》中记载：“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。”兰即“佩兰”，又叫“零陵香”，散发香味，驱除病菌，有利于健康。通过沐浴，搞好个人卫生，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。

饮食卫生也是重要方面。如汉代的《论衡》说：“鼠涉饭中，捐而不食。”《金匱要略》告诫人们：“果子落地经宿虫、蚁食之者，人大忌食之。”可见，古人在当时已经认识到，食用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。

此外，古人对环境卫生尤为看重。在甲骨卜辞中，已有在室内外打扫和除虫的记载。《周礼》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；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，当时称之为“都厕”；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，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人认为，许多传染病是由尘埃中得来的，因此早在秦国时期就对“弃灰于道者”要判处

一定的刑罚，城市的垃圾须按政府的规定处理。为防止尘土飞扬，保持城市卫生，官府常常征发百姓清扫街道，并洒水于道，这对于净化居住环境卫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由于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气中传播，如鼠疫杆菌经呼吸道排出后，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入他人体内，所以清代吴子存在《鼠疫扶微》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，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，房间窗户要通风透气。疫势危急时，要避开撤走，找个大树下的阴凉通风处居住，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。

对疫病的预防还表现在药物消毒方面。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著作《夏小正》记载，端阳时，“蓄药以罽（音juān）除毒气”，即通过药物，消除疫气存在的可能。用火熏燎的方法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。

另外，政府还会编纂颁行简便易用的“方书”，放于要道，便于众人了解疫病防治。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百一集验方》，一旦出现疫情，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。不久，他又“亲制《广济方》颁示天下”。

宋朝时则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行编辑医书，向各州县加以推广，向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。如宋仁宗时颁发了《简要济众方》，“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”，对照医书来救疫配药。

肆 “降疫”名医

陈念祖：《时方歌括》广布于世

陈念祖字修园，号慎修，福建长乐人，自幼家贫，刻苦习儒，苦研医术。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中举，后会试不第，寄寓京师，行医治病，因医术高明，有“医震京都”之誉。

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直隶大兴、宛平、涿州、良乡受灾后瘟疫流行，患者无计。陈念祖除施药救治外，还精选一百零八种药方，编为《时方歌括》，广布于世，并令人持药方至京城，救济疫民。

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，63岁的陈念祖以老病乞归，讲医学于长乐嵩山井上草堂，并著有《金匱方歌括》《伤寒医诀串解》等医书。

吴瑭：著有中医经典《温病条辨》

吴瑭字配珩，号鞠通，江苏淮安人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其借在京检校《四库全书》之机，阅读大量古今医著，刻苦钻研医术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北京瘟疫流行，医界多守伤寒论治法，收效甚微。吴瑭在汪廷珍等友人力促下，出而诊治患者。他另辟蹊径，以独特的疗法治愈数十人。此后吴瑭开始行医，提出清络、清营、育阳之治疗温病法则，创制了银翘散、桑菊饮、清营汤、清宫汤及加减复脉汤等诸方。

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北京流行疫病，年过六旬的吴瑭在京城设施药站，“制苦温芳香、扶阳祛秽之剂霹靂散以救之，大获奇效”。半月余，宛平、大兴、良乡诸县慕名求医者百余，吴瑭广施药剂，分文不取，被誉为“华佗传世”。

此后他遍采历代名贤著述，“去其驳杂，取其精微，间附己意”，并结合多年临床实践，著成《温病条辨》。这部书被中医学界列为中医“四大经典”之一，是学中医者必读之书。

相关链接

史上第一家传染病医院

建设专门的传染病医院，及时收治病人，避免疫情传播愈演愈烈——这种防控措施在古代也施行过。早在宋朝，杭州就有传染病医院。

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，刚上任不久就遇“饥疫并作”，他多方设法救济饥民，并上奏朝廷，多方救济饥疫中的灾民。

此后，疫情虽趋平缓，但灾情依然严重。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，苏轼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粟给平民百姓，还派专人每天烧粥施舍给穷人，煎药让无钱请医的病人服用。他派出专人带着医生在杭州城内四处治病，挽救了大批穷苦百姓的生命。

由于杭州疫情比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，单靠政府力量显然不够，苏轼还发动民间财力支援抗疫救灾。他献出个人黄金50两，再加上筹措到的官府纹银2000两，创办起一所病坊，名为“安乐坊”，收纳贫苦病人。之后，他又将“蓄钱粮”作为病坊的运转费用。病坊设立前后三年，治愈病人数以千计。可以说，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集资合办的传染病医院。

苏轼屡遇灾疫，看到大批百姓被疫病夺去性命，便开始研习医理，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，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《苏沈良方》。他早年从朋友处讨来秘方“圣散子方”，专治瘟疫。黄州连年大疫，苏轼便公开了此药方，“全活者不可胜数”，为历代医家称道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